

他总是出现在千钧一发之际 38年7次救下8条人命

一个杞县农民的救人轨迹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核心提示

今年54岁的杞县竹林乡郑寨村农民宋加民从小救人结下缘,38年来,他总是出现在千钧一发、生命垂危的紧要关头,7次巧合,8条人命在他的救助下转危为安,被村民称为“大好人”、“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曾大难不死,成为当地传奇人物。

为他人自己借信用社两万元

杞县竹林乡郑寨村位于杞县最南端,与太康县接壤,这里地势低洼,村子周围和中间有很多大水坑。一场春雨过去,村子里的道路泥泞,一脚进去就拔不出来。由于庄稼经常遭遇水淹,全村13000人口种庄稼只够口粮,经济主要依赖外出打工,全村很多人家至今依然居住在土坯房子里。

正在房后水坑喂鱼的宋加民听到有人找,54岁的他慢腾腾回来。走进宋加民家,脏乱差的院子里只有3间平房,这是他最大的家产,屋内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黑白电视机。他说:“我们这里没有啥经济收入,儿子、儿媳和女儿都到东莞打工去了,家里只有我们老两口和孙子、孙女。”

1972年初中毕业的宋加民当了一年生产队长,接着当上了大队的电工。在许多地方当电工是一个肥差事,可在郑寨村却是一个谁都不愿意干的差事。因为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收电费特别困难,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根本没钱交电费。

虽然最近几年电工每个月有200元工资,但对没有经济来源的宋加民来说,那是杯水车薪。“老人们无儿无女也不能不用电呀!他只好给他们垫上。从1974年当电工到去年他不干,他贷款26400元给孤寡老人交电费,现在这账还欠着信用社。”一位村民说。

因为眼花和腿患风湿病,和电打交道难免出事故,去年宋加民辞去了电工。

尽管欠款每年要给信用社付2000多元的利息,但宋加民并不发愁,他乐观地说:“我种的8亩地每年能收入4000元,够交利息了。我种了几百棵杨树,在房后的水坑还养了一些鱼,到时候把鱼和杨树一卖,一次性就能把欠款还上。”

在郑寨村了解宋加民的为人,大家都是一个答案:“他是一个大好人!”

好水性三次从水中救出三人

由于郑寨村周围有很多蓄水的大水坑,宋加民从小就在水坑里洗澡,练出了一身好水性,他可以双手举着衣服踩水200米。

1966年夏天,上三年级的宋加民中午放学时,和一群同学到邻村一个2米多深的水坑洗澡。不会水的同学宋刚滑到了水深处,同去的小孩子都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纷纷逃跑。看到同学在水中挣扎,水性不错的宋加民什么也没考虑游过去,把宋刚拉到岸边。喝了一肚子水的宋刚脸色煞白,休息半天才回家。

邻居侯传英的女儿因为生了一个女孩,男方和她离婚。走投无路的她,把姑娘留给妈妈,自己出去打工。2006年腊月的一个下午,侯传英在地里干活,让不满两岁的外孙女霍梦圆在附近玩耍。谁知道外孙女走到旁边的一个小桥上,一头栽到2米高的桥下面,脸朝下爬在2尺深的水里。说也巧,宋加民去接赶集的老婆刚从桥上过去不远,突然听到响声,他扭头一看在桥上玩耍的小姑娘不见了,马上意识到小姑娘可能掉下去了。他立即飞跑过去,跳下桥去救起小姑娘。当天晚上,小梦圆的爷爷、奶奶、外公、姥姥带着礼物上门感谢宋加民,他们说:“如果不是你救她,肯定没命了。”宋加民婉言谢绝送来的礼物,朴实无华地说:“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事儿,都会去救的,小事一桩,你们不用感谢我。”

2006年腊月二十八的夜晚,天气十分寒冷,宋加民一家人早早睡觉了。夜里11点许,本村养猪专业户郑金勇手提矿灯去水坑旁边的养猪场喂猪,发现水坑里漂着一个人。郑金勇立刻想到了水性好的宋加民,慌慌张张跑来喊宋加民:“加民哥,有人掉水坑了!有人掉水坑了!”

睡梦中的宋加民被急切的喊叫声惊醒,他顾不上穿衣服和鞋袜,只穿着秋衣、秋裤赤脚跑向水坑,看到一女人的头发漂在水面。他二话没说跳进水坑,游向女人。当他奋力把女人拖上水面时,他被压下去了。郑金勇急忙说:“不行,我去找个竹竿。”宋加民说:“来不及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5分钟时间,把女人捞出水坑。只见女人面色煞白、不省人事,命悬一线,他对郑金勇说:“不管是谁家人,赶快抬到我家,在你嫂子的被窝里暖!”

这时,听到郑金勇喊叫的村民都起床了。首先赶来的宋加民老婆认出女人是邻居牛延玲,就赶快往牛延玲家里抬。经过3个小时,到早晨5点钟牛延玲才会说话。天不亮,牛延玲的婆婆就来到宋加民家,跪在宋加民面前磕头说:“加民,多亏你救了她,你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呀!如果不是你,我们一家人就散了。”

原来,28岁的牛延玲外出打工回来,和家人人生了一点气,晚上8点钟就去跳水坑自杀了。多亏她穿的是羽绒服,浮力大,不然早就完了。得救的牛延玲说:“跳水自杀一次,尝到了淹死的滋味,再也不敢跳自杀了。”大年初六,牛延玲家大摆酒席,感谢宋加民和郑金勇的救命之恩。从此,逢年过节,牛延玲家人都要上门感谢宋加民。

当电工死亡线挽回两人生命

过去农村学校有秋假。1970年秋假,正在上初中的宋加民和村民们一起在生产队砖窑窑干活。50岁的宋有朋不经意间摸到了裸露的电线头,380伏的电压刹那间将宋有朋倒在

地,好多人看着不敢动。宋加民勇敢上前,用力将粘在手中的电线拽下来,甚至拽下来一块肉。被电击昏迷的宋有朋躺在地上3小时才苏醒过来,3个月后烧伤的伤口才愈合。宋有朋朋友就说:“如果不是加民眼疾手快,我就被电打死了。”

1978年春的一天,已经当电工的宋加民正在大队广播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突然广播停止了,他赶忙走出广播室查看线路,发现村民郑先民倒在地上,裸露的电线搭在郑先民的身上。原来,那时的电线杆都是木头的,从地里把地回来的郑先民赶着骡子路过一电线杆时,骡子把电线杆挂倒,裸露的电线落在3头骡子身上,把3头骡子打倒在地。郑先民抢救骡子时,把电线挑到自己身上。

对电力知识了如指掌的宋加民急忙上前,拉住电线杆将电线从郑先民身上拽下来。刚刚结婚的郑先民被抬回家后,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宋加民安慰他们说:“不要紧,让他好好躺着呼吸新鲜空气,慢慢就过来了。”两小时后,郑先民苏醒过来,一家人破涕为笑。

采访时,已经50岁的郑先民说:“不是加民侄子及时赶到,我30年前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从那以后,我这一辈子最害怕的就是电。”

偶然相遇先后挽回三人生命

竹林乡的公路既窄又处处坑坑洼洼,可行走在乡间的汽车往往撒野,向行人显示威风。2002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宋加民在乡电管所开完会骑自行车回家路上,一辆带拖挂的货车疾



速向放学回家穿过公路的两个10多岁孩子奔去。正好让走在旁边的宋加民看到。就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他跳下自行车,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扔,冲上前去,猛力将两个孩子推到路边的沟里。货车“喇”一声过去,差一点他被车挂倒。两个孩子吓得脸色苍白,傻愣了好长时间才从沟里上来。

200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邻村的一位老太太来到郑寨村的水坑边想自杀。这个老人宋加民不认识,宋加民观察老太太许久,在心里打鼓:“天已经快黑了,老人家为什么坐在水坑边不走?会不会发生意外?”他来到老人面前问话,老人只说想活了。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老人跟他回家。在聊天时,才知道老人是宋加民儿媳娘家村的。宋加民让老人吃完饭,给她儿子打电话把老人接回去。老人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和儿媳关系不和。

“可惜老太太去年生病去世了!”宋加民惋惜地说。

一盘带苍蝇的菜

透析垃圾短信“罪恶”之源

核心提示

日前,一姓高的先生拎着手机找到新华社的编辑部,向记者展示他手机上数不胜数的垃圾短信。有诈骗的、推销走私汽车和枪支的、卖房装修的、五花八门。高先生气愤地说,他有一个上初中的女儿,手机还经常收到“高薪招收公关先生小姐”的短信。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3·15”曝光某信息公司通过中国移动大量发送垃圾短信以来,移动网络的垃圾短信呈“报复性反弹”,记者和身边的朋友、同事,平均每天收到两条以上垃圾短信。合肥公安相关部门4月6日在当地主流媒体上发布警示文章《短信诈骗又出新招》,提醒广大市民自我保护。

原本是通信辅助工具的短信息,为啥变成垃圾满天飞?负责运营并从中获利的移动通讯运营商,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短信息控制技术与生俱来,垃圾短信充其量只是运营商手中的“孙悟空”

记者长期关注移动通信领域,采访过大量移动运营商的领导和相关专家,综合各方面信息得知,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通讯网络,自上世纪90年代全面进入到数字时代以后,一副产品短信息问世。作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无论其终端发放、信息发送及传播过程,均是可控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投放市场。当时我国一些城市经常看到西装革履、手持大砖头似的移动电话的人在路边狂吼,人们形象地把这一代移动通信终端称之为“大哥大”。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研制了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其中最有代表性和比较成熟的制式有欧洲的GSM,美国的ADC和日本的PDC等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其中1991年GSM系统正式在欧洲开通运行。我国1992年引入GSM,并于1993年9月



正式开放业务。现在中国手机用户中绝大部分采用GSM系统。本世纪初,中国联通在运营GSM网络同时,引进并运行美国高通技术为核心的CDMA。最近,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TDSCDMA开始试运营。根据最新统计,我国的手机用户目前已近5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约40%,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国度。中国GSM、CDMA移动通讯网络及运营商,自然都是“世界第一”。

垃圾短信的发起者是手机。当移动通信技术进入到数据时代,终端已经完全在运营商的控制之内了。中国制式的手机都实行“机卡分离”,手机实际上包括两部分:承担编码、发射和接收的手机裸机,识别和绑定客户身份的智能卡(SIM卡)。指甲大小、插在手机里的智能卡上印有一串数字,这是全球唯一的识别符,非运营商无法复印。运营商利用这张卡,不仅可以知道用户的身份,还是记录漫游、话费量等唯一依据。它入网运行,有一串只有运营商才掌握的加密、还原程序。用户每一次开机或异地使用的时候都会重新验证。如果不是运营商认可的SIM卡,是有可能在移动网络上运行业务的。

利用SIM卡管制移动网络不良行为和垃圾短信有两条路线:其一是控制SIM卡的发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不良信息发生的源头。最早移动运营商发卡如同银行发信用卡,对身份控制很严,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但随着独家垄断的打破和各级各区域运营单位间的竞争,这一要求被弱化,各移动运营商都开始发行各种名目的免身份登记的SIM卡。换言之,“给钱就行”。有些地方运营商为促销,对发展用户进行补贴。于是出现内外勾结,伪造用户身份信息“洗卡”获利的现象。SIM卡管理无序和把关不严,给少数人利用短信息或其他通讯手段作出非法或不道德行为留出了缝隙。其二:移动运营商的网络系统非常强大。完全有条件对SIM卡的使用进行诚信记录,甄别出用户情况,从而针对极少数用

户严加监管和实时控制。但这项工作费力多、收益少。据了解,类似的管理系统,移动运营商并不是没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两大运营商都有记录用户话费量、是否按时交费用户信息系统,但其主要用途是区别出用户的消费能力,提供不同水平的服务。

在短信息的入网、发送过程中,几乎也是全程可控的。短信息是利用信令通道发送的文本信息,255个字节的“包”中,有140个字节(每汉字占两个字节,最长允许70个汉字)供用户使用,其他用于记录发送者身份、时间、地点等信息。不同于通话,其允许适当的延时。手机将短信息送入运营商的短信息中心,短信息中心根据去向进行分发。如果到达手机或不在网络,短信息会存在短信息中心,并根据设定时间不断试探,用户一开机即予发送。短信息经过负责接收和转发的短信息中心,中心技术系统可以对其内容进行监控。可以控制发送频率,即每一部手机(号码)规定时间不可以发送多少条同样内容短信息,等等。“仅从技术角度,垃圾短信只可



能有漏网之鱼,不可能‘泛滥’。”安徽联通从事技术管理的一位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地说。

计算机和移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运营商对用户行为的控制越来越细致、有力。记者能够了解到的,微乎其微。可见,垃圾短信就是一个筋斗可翻十万八千里,孙悟空,只要如来佛一抬手,还不得到山下去做500年的大梦。

运营商见利忘义,已经由“绥靖政策”转变为垃圾短信的最大源头

据市场调研公司估测,中国每天未经许可的短信广告约为10亿条左右。这里还不包括诈骗、办伪证、推销不法商品等短信息。在垃圾短信的制造大军里,利用“群发器”、个人手机发

送的,最多只能算是游击队。更多的是与运营商合伙挣钱、披着合法外衣的“正规军”。追根刨底,见利忘义的运营商,已经由“绥靖政策”转变为垃圾短信的最大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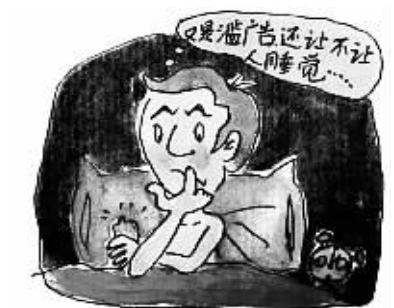
现在通过移动运营商网络授权许可可以大规模向用户发送短信息的渠道有两条,其一所谓的“企业短信”,其二是持合法证件接入移动网络的信息服务商。

今年“两会”期间,央视披露了分众传媒某些分支机构发送垃圾短信的新闻,社会舆论哗然。这里用的就是“企业短信”渠道。

“企业短信”实质是短信息批发。移动运营商用较低的价格把短信息发送权批发给零售商,零售商再加价批发给需要大量群发的用户,形成链条。有的零售商利用与运营商的关系,以较低价获得发送权,还二次批发、三次批发。在这个链条中,源头移动运营商是在推销自己手中的网络与用户资源,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运营商。普通用户短信息发送一条成本为0.10~0.15元,批发来的一般会有0.05~0.08元左右。大的批发商从运营商处拿到的价格根据量的大小会有浮动,最低据说只有0.02元。有些城市还有“小区广播”等用户进入一定范围内就收到短信息广告的自动发送模式。分众传媒滥发短信息事件暴露后第三天,中国移动的新闻发言人表示,封闭了分众传媒这几个分支机构的发送端口。并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但为什么全国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此类短信息商仍在活动?原因恐怕还是要看收益的大头究竟为谁所得了。

以信息服务为主的增值服务,是移动网络提高附加值的重要渠道。2000年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后来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学习日本DOCOMO,建设统一接入平台,动员社会上符合条件的单位、企业加盟,作为信息内容服务商(ICP),把80%以上的收入留给企业,作为优惠条件,大力开展移动网络信息服务。到2004年、2005年,信息服务市场成熟了,但ICP恶意圈钱已成社会一大公害。运营商趁需要“大力整顿”之机,把肥美的业务拢到自己的某个口袋里,接着运营。

据专业研究机构艾瑞调查公司(iResearch)统计分析,移动运营商来自短信息为主的增值服务收入自2004年突破300亿、达到341亿元后,仍在迅速提升。今年肯定会在千亿元以上。移动运营商的增值服务收入,均已超过总收入10%。面对这块巨大的肥肉,有企业逐利性的运营商,不可能无



动于衷。而对运营商中具体管理者来说,这是灰色收入的广阔地带,也不会轻言放弃。

这种渠道霸主与短信息制造发送者同为利来、狼狽相与、坐地分钱的关系之下,拒绝垃圾短信、保护消费者利益就无从谈起。

享受“垄断”市场者该不该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谁来问责运营商?

上文提到的高先生有这样的疑问:“我的手机稍有漫游,移动公司漫游费用就不会少记一分。坐飞机到再远的城市出差,一开机打电话就是长途。据说很多项目是以秒计算。难道说就只有短信息控制不住?让移动公司的人下饭店,端上来一盘菜加一只苍蝇,他们会连菜加苍蝇一起吃了还乖乖交钱?现在5亿手机用户就是在花钱吃移动公司夹带苍蝇的菜。”

垃圾短信已成困扰半数国人的一大公害。喊打之声,年复一年。2004年4月19日,信息产业部发布了《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开展了全国性ICP整顿,垃圾短信发送打击等。2006年初,信产部又针对垃圾短信专门公布了举报电话12300。2007年2月,在信息产业部一次工作会议上,又针对手机实名制管理提出与相关部门加快制定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今年“两会”刚过,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就透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起草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在报批,明确禁止发送违法内容和违规发送垃圾短信行为。同时还起草了新的技术规范。

短信息自2000年大规模运营,到今年共8个年头。打了4年,甚至动用公安,发动群众,但结果却是逾打逾滥,到底为何打不到“七寸”?

“从系统的独立性和技术专业性的说,垃圾短信的控制与消除,移动运营商应起主要作用”。参与垃圾短信治理

和经济案件查处的合肥市公安局经济案件侦查大队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移动的运营网络是非常独立的,公安去查个用户数据还得有高级别机关的介绍信等手续,网络情况无法了解,更不可能让外单位介入。所有垃圾短信都是从移动网络上发出去的,发送来路他们更清楚,控制技术由他们掌握。运营商把不住“进门”,看不住“总闸门”,其他职能部门只能望其兴叹。

肥西县公安局一位干警说得更为形象:“如果垃圾短信是赃物,移动运营商就是销赃者。因为每发一条短信息,他们总是有一毛钱左右的收益。”

资深律师、安达律师事务所所长马军指出:“享受利益必然要承担义务。中国的移动运营商,无论是牌照发放还是运营,都是相对垄断。网络也是封闭和垄断的。企业因垄断而获得高额利润,管理人员既拿国有垄断企业的高薪酬,又享受行政级别。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完善网络还是净化产品角度,都是有责任的。况且,垃圾短信的发起者很多是要给移动运营商交钱的。在得到的情况下传播,扩散危害社会的东西,你说能够躲过去吗?只是这是新出现的问题,是社会公害,个体如要起诉,还难以提出赔偿要求。在国外,就有诉讼烟草公司而获得巨额赔偿的案列。”

企业家出身的合肥市人大代表王家文分析:“一个出售的产品,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甚至有上万个零件。如果产品出问题,最终产品出售者要负责任。至于是否向上追溯,就是出售者的事了。我们现在是交钱购买移动运营商的产品,饱受垃圾短信之苦,就冤无头、债无主了?”

移动通讯网络有极大的特殊性:一点接入,全网服务。同时,全国是有机的运营整体,控制某一点,基本上没有作用。更重要的是移动运营商“金多价高”,单一的手机用户与之相比,轻重严重失衡,无法较真。但既然其产品已成涉及“祸害”近半数国人的公害,那么到底谁又来问责移动运营商呢?

写作此稿时记者又收到多条垃圾短信,骗汇款的、贩黄的、卖产品的,五花八门。

据新华社



漫画均画袁衣客 绘

